



美国国务院与 中美关系缓和研究 (1969~1972)

The Study of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 the Sino-U.S. Rapprochement (1969-1972)

张 静 / 著



美国国务院与 中美关系缓和研究 (1969~1972)

The Study of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 the Sino-U.S. Rapprochement (1969-1972)

张 静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国务院与中美关系缓和研究: 1969 ~ 1972/张静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8303 - 0

I. ①美… II. ①张… III. ①中美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969 ~ 1972 IV. ①D829.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1560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美国国务院与中美关系缓和研究 (1969 ~ 1972)

著 者 / 张 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赵 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303 - 0

定 价 / 8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次令人震惊的“尼克松冲击”。在回忆录中，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以打开美国对华关系的大门作为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同时极力淡化、削弱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在政策酝酿和外交行动方面的作用。他们的这一说法，引导学者把对中美关系缓和历史的研究重点，置于白宫尤其是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忽视了国务院发挥的作用。

然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说法值得质疑，学者的研究值得商榷。本书根据尼克松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档案资料，以及历史活动参与者的回忆录和口述资料，解释尼克松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务院在外交事务中职权形成，梳理它在中美关系缓和历史进程中（1969~1972）的政策设计和外交努力，并评价它的作用。

外交决策的过程从设定决策体制就已经开始，职权随着机构的设立和职责范围的界定而形成，随着官僚政治的斗争而变化。在尼克松的授权下，基辛格主持设计的国家安全体制划分了外交决策程序中的权力和职能。美国国务院在缓和对华关系中的职权范围即由此体制设定。从机构的角度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超越国务院成为外交决策的核心，是国务院、国防部等其他政府部门向总统提出政策建议的唯一正式渠道。就个人而言，尼克松在基辛格的协助下，通过调整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等官僚机构，将外交决策过程置于总统和总统助理的掌控之下。尼克松第一任期内，国务院的职权虽受到限制和削弱，但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相比，它在推动缓和对华关系上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在提出对华主动缓和的政策建议方面，国务院内负责中国事务

的官员提出的政策建议及在台湾问题上提出的表述，被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所采纳，为缓和对华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基辛格令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利用国务院成果的同时，却有意忽视国务院报告本身，降低其重要性。由于国务院官员不知道中美“幕后渠道”的政策交流，不确定中方的政策意图，“无法预知改善中美关系的利益是否能抵消僵化美苏关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将对华主动的措施分为短期和长期。最终，国务院酝酿在长期实现的政策却为白宫所利用，成为在秘密会谈中对中方的重要许诺。

第二，在外交运作方面，在尼克松政府缓和中美关系的初期（1969～1970），国务院参与设计并推动执行的放松对华贸易和旅行管制、主动恢复大使级会谈等外交举措，是美国政府向中方发出的最为明确的缓和信号。这一系列主动措施进入了中国领导层审度国际局势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对美国的认识，迎合了他们的战略需要。但是，国务院为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努力，最终却被白宫秘密运作的“幕后渠道”邀了功。

第三，与国会及盟国进行政策互动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职责之一。尼克松向国务院、国会隐瞒了对华“幕后渠道”外交的实情，拒绝让基辛格、霍尔德里曼等人向国会汇报实质性的事务。这使国务院沟通国会、向国会及时传达美国对华主动政策的重要性得到凸显。由美国国务院主持的日美规划会谈和北约大西洋政策咨询组会议，虽然是美国同日本和北约盟国政府官员间非正式的磋商机制，却传达了美国对华主动政策的内容和精神，为转变战略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同时也成为收集各国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反应的平台。同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所制造的“尼克松冲击”相比，国务院与盟国的政策互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国务院的职权尽管受到削弱，但它仍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隐没于白宫通过幕后渠道实现的秘密外交的成功背后。

序

牛大勇

1969~1972 年间的中美关系解冻，是扭转冷战格局、改变世界进程的一个大事件，各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就美国的相关决策过程而论，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都集中于尼克松-基辛格相辅相成的“秘密外交”“幕后渠道”的机制。一般来说，美国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密切合作而产生的重要作用，是重大决策中最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更何况，在这一改变世界进程的外交决策中，尼克松、基辛格“台前幕后”的一切表演光彩夺目，近乎完美无缺，无怪乎能够吸引衮衮诸公的注意力。

但是，在这一舞台灯光炫目聚焦下的“外交双雄”的身影背后，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的职权和角色，却黯然失色，往往被人们看得无足轻重甚至相当消极保守。学界对这个政府外交主管部门在一个重大决策过程中所起的制度性作用，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的白宫班子在美中关系决策机制中的分工、合作与分歧、矛盾等等，缺乏深刻地探讨。

张静注意到了这个缺失，在扎实的原始材料调研基础上，参阅了丰富的现有前沿研究成果，选择这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我一向主张研究生独立思考，自主选题，导师尽量起辅导、评审其选题的作用，最好避免给研究生命题作文。因为，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如何在茫茫学海中摸索前沿问题，探寻自己的航向，自主地找到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她/他成长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的必要一步。我尊敬的史学前辈田余庆先生说过：研究生还要导师给选题吗？如果不会自己选题，我看这个研究生是白读了！诚哉斯言。我遵循这个教导，鼓励

自己指导的研究生自主选题，我做参谋。

张静这个选题，是几经推敲，并在选题报告评审组的各位老师评点下，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情况，斟酌而定的。我赞同她的思路：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解冻进程中的职能和参与决策的实际作用值得研究，因为这是理解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权的架构和决策机制的核心课题，也是人们需要重新审视尼克松－基辛格“秘密外交”的重要依据。对这一问题加以深入研讨，对分析当代美国外交的决策机制和政府官僚政治的影响，也具有重要价值。

作为解冻中美关系的美方核心决策者，卸任后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分别撰写回忆录，对一场成就显著却又饱受诟病的“秘密外交”，不无自觉地加以辩护和赞美，同时又极力淡化国务院等官僚机构在政策酝酿和外交行动方面的作用。20世纪70～90年代，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受法律和国会的困扰，没有得到历任总统由国会拨款建立自己的总统档案馆的待遇。其执政时期的政府档案，迟迟不能集中和开放，致使这个研究课题的原始资料一时难于搜集。

当事人的话语权常有高下之别，尼克松、基辛格的回忆引导学者将中美关系解冻的研究重点置于白宫，尤其是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上。中国学者对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也几乎一致地赞誉有加。

随着美国国家档案馆开放了尼克松政府的档案，美国民间捐资筹建了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张静这个课题的研究条件具备了。她和之前之后的同门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下，寻找一切机会，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海外各有关原始史料聚集地。其中曾以一年的机会，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总统图书馆等处大量查阅和搜集档案资料，走访有关人士和专家。在此前后，还找到其他机会在海外做相关的调查研究。她还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当时刚出版的尼克松政府的对外关系文件集、各种网络数据库，加上回忆录、日记和口述史资料等，我觉得她搜集的公文档案和个人回忆材料，数量之充足，类型之丰富，在相关题目的博士论文中是少见的，达到了史料基础扎实可靠的要求，体现了力求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些年来，有关国外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论著有相当严重的一种倾向，即不注意相关原始资料的搜集利用，而把主要论点和论据建立在已有的论

著和二手资料上。这种方法，不是不能有所创新、超越前人，但是更可能导致大量复述前人成果或曰“炒冷饭”，甚至有意无意地陷入抄袭。有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抄袭，往往采取各种手法，遮人眼目，直至通篇大段地把外文原作“中文化”。对一部研究专著和论文，最简单而有效地检验其创新度的方法，也许就是翻看一下其大段论述和主要论点所依据的资料是否是原始的、第一手的，论据是否扎实可靠。记得我念本科时，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论文稿交给陈庆华老师，他首先翻到最后几页，看注释中用了什么材料。当看到有英国蓝皮书时，就追问我是否自己去查过蓝皮书，在哪里看的。我回答是自己在老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查看的。他可能觉得还值得审阅，就点头收下了。当然，这种办法也会有漏洞，例如可能有伪注。但仍不失为一种检验创新成色的简便办法。张静这类论文，就经得住这样的检验。

但是张静也是命运多舛。当她在美国搜集资料最吃紧的时候，偏偏得了急病，她本人和作为美国东道主加州大学欧文校区的指导教师陈勇，都打越洋电话来详陈病况，担心她坚持不住，考虑赶紧回国治病。这意味着放弃这次旅美访学的机会，停顿研究工作，再找到类似机会就不容易了。我不知详情，也无从判断，只能让她自己决定。结果，她毅然选择了冒险留下，继续奔波搜集史料。我那时除了为她祈福之外，只有佩服。

她身体稍好时，又面临一个访美学人都可能面临的诱惑：要不要留在美国攻读学位？她有去处，也动过心。我劝她先回国完成学业，拿下这篇博士论文后再考虑其他发展道路。我并不反对弟子们出国读学位，也愿意帮助他们找机会，但认为半途而废地中断博士学业去另走一条新路，总体看是在走弯路。另外，我还觉得她不适于长期留学。她后来下决心按时回来完成学业，走上了今天这条路。在我看，走得还不错。也使我更加相信：历史是人们在诸多的可变因素中不断地选择前行道路的结果。

她这部专著《美国国务院与中美关系缓和研究（1969～1972）》也是从“道路选择”的历史视角，分析美国1960年代以来持续地考虑和选择对华新政策的过程中，国务院的职权和角色。通过梳理它在中美关系缓和各个阶段的工作，探究其作用，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部门在参与和辅助决策层对华采取和解政策的历程中，虽然不时受官僚机制的排斥和压

抑，但仍然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措施，做了很多贡献，发挥了重要影响。甚至，它主张按照正常程序循序渐进地推进对华关系的改善，这条道路的选择，或许有可能和国会一起提供有利于中美关系在更为长效合法的基础上发展正常化的前景。而尼克松、基辛格以突出个人作用的“秘密外交”，绕开国会和政府机构“上演”戏剧性十足的系列访华，所造成的效果虽然轰动，但不够稳定和长效，可能是后来中美关系一波三折、踉跄而行的肇因。甚至连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时间，如果按照国务院和国会两党领袖的想法做，也可能早于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基辛格为了凸显自己个人的历史作用，有意地一再不批准具有立法地位和公众舆论引领作用的国会两党领袖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和斯科特（Hugh Scott）早就提出的访华申请。至于国务院长期苦心孤诣地拟就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各项措施，也一直被压在白宫，直到尼克松访华需要前奏和礼单时，才被有选择地公布。而后来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台湾问题，也有部分原因是尼克松、基辛格抢出个人风头，未待与行政部门熟筹并让热心十足的立法机构通过，就采取“联合公报”这种方式宣布了一个似决未决、带有若干伏笔的方案，以致严重开罪了国会和国务院。

这些观点，当然可圈可议。但因其持之有据，驳之也应有据。面对大量的原始材料，最怕的就是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有些人，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也有些人，有三分材料就敢说十分话。更有些人，没有材料也能做长篇大论。他们善于“大胆地假设”，却不会“小心地求证”。

张静的著作弥补了以往学人集中探讨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作用所造成的缺憾，即对美国决策系统不完整的认识和叙述。她以言必有据的史学笔法，详细地论述了美国国务院针对中美关系所做的各项工作，指出其政策设计和外交努力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起了填石铺路的作用。书中揭示了国务院与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会的复杂关系，讨论了职权分工、权力斗争、人际关系等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表现和意义。在作者看来，由于白宫把国务院排斥在顶层战略设计之外，对其隐瞒美中“幕后渠道”外交的情况，使后者无法清楚地了解白宫的战略思维，造成了后者在政策制定上的保守和被动形象。她的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中美关系史中决策制度和权力运作未受重视的问题。理解美国对华决策机

制、国务院与其他决策机构之间的关系，需要这样深入的研究。

不过，依我之见，这部著作只是这项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还缺少社会科学特别是政府学的分析方法，未能进一步揭示美国国务院在中美缓和关系过程中没有发挥更大作用的多重原因。作者似也感染了学者难免的“流行病”，即在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史料中沉浸越深，越容易产生主观感情上的偏向。与此同时，限于中国相应的原始材料尚未开放，作者未能对中国的战略与政策做出如对美方那般的深度研究，对中国的意图只能做少许推测，因此未能对中美双方的战略互动给出一个全面的构图，以致对美国政策得失的探讨颇有见地，对中国政策得失的分析则付之阙如。

屈指算来，我已从教30年。看到弟子们一个个学成出道，纷纷忙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陶陶乐于“常下馆子”（茅海建语，指去档案馆查史料），进而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私心曷胜欢慰！张静最近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人选，新著又将付梓，嘱我为序，欣然命笔。衷心期望他们恪守正道，严谨学风，为人类不断增长的知识宝库，增添自己独创的一砖一瓦！

2015年11月23日于柏林蜗居中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制度与职权	016
一 职位与权力	017
二 决策机制的形成	033
三 决策方式的影响	043
四 国务院的争权与改革	054
五 国务卿的失势与离职	066
小 结	079
第二章 政策研究	081
一 因势利导	082
二 三角战略	097
三 中国与国际合作	116
小 结	132
第三章 与国会及盟国的政策互动	134
一 与国会的政策互动	135
二 国务院规划协调室	142
三 美日规划会谈	146
四 北约大西洋政策咨询组会议	158

小 结	161
第四章 外交行动	163
一 筹划会谈	163
二 放松管制	180
三 再续会谈	192
四 高级别会谈纷争	218
五 联络渠道转换	231
六 加快主动	240
七 实现突破	247
小 结	266
结 语	270
一 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冲击	270
二 国务院职权的形成	278
三 国务院与中美关系缓和	286
附录一 美国国务院机构设置及人员（1969～1973）	295
附录二 美国国务院部分官员的背景及口述资料	299
保罗·克里斯伯格	299
多纳德·安德森	303
马歇尔·格林	306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20

绪 论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访华，宣布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次令人震惊的“尼克松冲击”。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实现，打破了中美两国间长达20多年的坚冰；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均称是他们的对华主动行动打开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大门，并将此作为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在对自己的对华秘密外交进行辩护和溢美的同时，他们还极力淡化、削弱国务院等官僚机构在政策酝酿和外交行动方面的作用。^①这一说法以及尼克松和基辛格以秘密外交、个人外交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历史事实，引导学者将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重点置于白宫尤其是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并对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给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国际格局带来的重大变化赞誉不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一些学者认为，尼克松制定和实施了经过调整的外交政策，重新定义了国际关系与秩序的概念，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大国政治和遏制共产主义为特征的国际关

^① 尼克松一直对国务院颇不信任，认为国务院不效忠于他，经常泄密。基辛格则认为，对华主动中许多行动方案是出于他的设计。参见〔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伍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464页；〔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全集》（以下简称《白宫岁月》）第1册，陈瑶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3、18、32~40页，特别是第37、208页。尼克松厌烦官僚机构的争议和惰性，在上任之初，他竭力通过对官僚机构的整合来削弱国务院的作用和影响，参见《白宫岁月》第1册，第54页。关于基辛格对国务院在同中国建立联系方面的种种掣肘的记述，参见《白宫岁月》第2册，第879~890页。

系，朝着相对合理和稳定的结构发展。^①其中，对于尼克松对中国采取的主动行动的胆识和功绩，中美学者更是不吝溢美之词。^②

1988年以来，随着美国国家档案馆尼克松总统时期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③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尤其是他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给日后美国对华外交带来的影响。例如，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Tyler）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的对华缓和政策与其说体现了某种深思熟虑的战略，不如说是一种对形势发展的机会主义的反应，他们在这—事件中实际扮演的角色，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情况存在出入。^④孟捷慕（James Mann）认为，尼克松、基辛格在谋求对华缓和时做的让步过多，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损害。^⑤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的研究揭示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权力关系，并且提出是尼克松首先发起了对中国的主动和解。^⑥

① Robert E. Osgood, *Retreat From Empire? The First Nixon Administr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28.

② Alan M. Jones, Jr., ed., *U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1969–1973*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3), p. 27; Thomas A. Bailey, *Diplomatic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Prentice Hall, Inc., 1974), pp. 925–928; 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Michel Oksenberg, Robert B. Oxnam ed.,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 123; C. L. Sulzberger, *The World and Richard Nix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ress, 1987); Franz Schurmann,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Richard Nixon: the Grand Desig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02–107, 196–238; Richard C. Thornton, *The Nixon–Kissinger Years: Reshap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pp. 15–24, 308–324; Jonathan Aitken, *Nixon, A Life* (Washington, D. C.: Regnery Pub. Lanham, MD: Distributed to the trade by National Book Network, 1993), p. 425; 何慧：《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14页。

③ 从1988年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逐步允许学者利用多达4200万页的尼克松总统文件，并且大批解密尼克松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至2000年、2001年，这些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得到了进一步解密。1999～200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大约3700小时的尼克松总统录音资料。

④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p. 47–89.

⑤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8), p. 30.

⑥ Robert Dallek, *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7), p. 266.

然而,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的诱导,以及有关的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的缺乏,白宫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中美关系缓和甚至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外交的学者的首要关注。他们接受了美国国务院被排斥在尼克松-基辛格核心决策之外,并没有在外交事务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说法。在这样的看法之下,一些学者开始了对尼克松本人个性、决策风格的研究,以此来解释尼克松政府时期白宫、总统权力的膨胀。

早在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就有学者指出,尼克松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致力于通过政治、不惜对其他人造成损害而获得权力,并且依据对自身政治生涯造成的损益来权衡决策。他的外交政策不过是“极端的个人外交”。^①“水门事件”之后,这种批评进一步发展。^②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才开始重新探寻一个“真实的尼克松”,试图抛开“水门事件”来看待一个富有才能、看重政治手段胜过个人魅力的政治家,不再对其个性和行为任意解释,而是倾向于分析尼克松的战略和政策。^③在尼克松晚年,英国国会议员乔纳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为其撰写的传记,以对尼克松的政治事业和外交政策的尊敬而成为对尼克松溢美之至的作品。^④随着材料的丰富,学者开始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对尼克松的个性、领导能力、战略眼光、秘密的行事风格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⑤

① Gray Allen, *Richard Nixon: The Man Behind the Mask* (Belmont, Mass.: Western Islands, 1971), p. 51; Bruce Mazlish, *In Search of Nixon: A Psychohistorical Inquiry*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3); Rowland Evans Jr., and Robert D. Novak, *Nixon in the White House: the Frustration of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 176-242.

② Fawn McKay Brodie 将尼克松描述成一个精神错乱的人,深信破坏性的攻击和毫不自责的病态的撒谎是达到他的唯一目的——政治权力终点的可以接受的手段(*Richard Nixon, The Shaping of His Character*, New York: Norton, 1981)。Roger Morris 将尼克松描述成一个以输、赢来定义人生成就的人,将个人成就同一种难以抑制的对于个人所得和认可的欲望相联系(*Richard Milhous Nixon: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 New York: Holt, 1990)。

③ Tom Whicker, *One of US: Richard Nix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C. L. Sulzberger, *The World and Richard Nixon*; Franz Schurmann,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Richard Nixon: The Grand Design*, p. 3; Richard C. Thornton, *The Nixon - Kissinger Years: Reshap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④ Jonathan Aitken, *Nixon, A Life* (Washington, D. C.: Regnery Pub.; Lanham, MD: Distributed to the trade by National Book Network, 1993).

⑤ Richard Reeves, *President Nixon: Alone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学界对尼克松本人的研究，尽管存在从早期受“水门事件”影响而大加挞伐到后期对其政绩予以公允评价的转变，但对他与基辛格在制定、实施对华缓和政策过程中严密控制外交、绕开国会、排斥国务院、操纵权力的做法，一直有所诟病。尼克松第一总统任期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霍尔德里奇（John H. Holdridge）认为，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政府内各部门的复杂关系，迫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秘密外交的形式。^①尼克松的传记作家艾特肯也认为，由于国内保守派的政治压力，尼克松采取的秘密外交是必须之举，并且认同尼克松自己的解释，即秘密方式是对华主动政策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即便如此，艾特肯仍然指出，将国会蒙在鼓里，无疑挑战了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有发言权的立法机构的权威。^②塔德·肖尔茨（Tad Szulc）并不认可“对外政策是尼克松任期内最富有建设性和积极性一面的看法”，认为由于“富有想象力却狡诈十足的外交，冷眼观望的现实政治，玩弄权术以及动辄采用的保密手段”，尼克松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的，只不过是和平的幻想而已。他批评了尼克松在对华关系上主动出击、采取秘密外交、主要由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开展外交决策的方式。^③杰里米·苏芮（Jeremy Suri）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使“秘密”成为领导方式的核心原则，将政策谋划孤立于他们最害怕的敌人——民主的官僚机构、记者和批评家之外。虽然尼克松“天才地”使苏联和中国互相争斗，以“三角战略”在僵冻的两极世界中打开了新的政策空间，但他诡秘的行事风格和对政府的操纵，也使自己疏离了国内的支持者，从来没有将他们融入政治体系。^④

从上述研究状况来看，无论是对尼克松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历史过

① 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 S. - China Relations*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7); Robert Dallek, *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② Jonathan Aitken, *Nixon, A Life*, pp. 426 - 427; Richard Reeves, *President Nixon: Alone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③ [美]塔德·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邓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④ Jeremy Suri, *Power and Protest: 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程的叙述，还是对尼克松个人决策风格和尼克松、基辛格秘密外交方式的研究，都仍然集中于总统、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即便有些著作开始批评尼克松和基辛格严密控制外交、绕开国会、排斥国务院、操纵权力等行为，但是由于材料的局限，未能详细描述、解释这样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尼克松总统时期，外交决策的程序和权力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集中到个人的手中的？美国国务院的反应如何？它的职权和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在中美缓和进程中有哪些政策筹划和外交活动？由于研究思路和材料的局限，受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排斥的美国国务院，在学者有关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研究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利用尼克松政府时期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解密档案，以及历史活动参与者的回忆录和口述资料，深入探讨尼克松第一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务院在外交事务中职权的形成，并通过重新梳理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中美国国务院的活动，考察国务院在美国缓和和对华关系中的作用及成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时至今日，尼克松-基辛格绕开国务院的秘密外交，仍给中美关系遗留了许多隐患。重新审视和理解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外交决策的权力架构、美国对华决策的机制和过程，关注国务院在其中的活动和作用， also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内，美国国务院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被“边缘化”，它在1969~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中的角色，正是这种职权地位的表现。研究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缓和和历史进程中的职权和作用，离不开对一个关键问题的考察，即它参与美国外交决策与执行政策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此外，国务院提出了哪些对华主动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是否被白宫采纳？它做出了哪些外交努力？它与白宫的主要分歧是什么？产生分歧的原因何在？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都还很欠缺。

迄今，除档案资料外，有关美国国务院与中美关系缓和的口述资料，主要有两本。1994年，由于十分不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的记述，由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牵头，几位历史参与者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